

【民族文化】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论析

田海林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既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采取的重要实践方略,也具有深刻的理论和方法意义。从认识论角度看,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对人们增强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但是,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必须奠定在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准确理解基础之上,由此才能找到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正确路径。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标识;共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田海林,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北京 100031)。

【原文出处】《广西民族研究》(南宁),2022.5.29~36

一、引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人们最深层次的认同。让人们于潜移默化中不断认识和理解身处其中的文化并对其产生强烈的认同,既是认同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文化符号或视觉形象(“标识”)是人们文化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绝大部分来自视觉。如此观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重要论述,就不仅仅是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提出的重要实践方略,还有着极其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简而言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可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常说的“符号”与“标识”,首先是与视觉关联在一起,因为当人们谈论一种“符号”或“标识”的时候,总是通过“看”而获得对它的最初认识。视觉是通过视觉器官——眼睛,来接受一定波长的外来光刺激,经过视觉神经和大脑进行编码加工及分析处理后所获得的直观感觉。

研究认为,人所感知的外界信息超过80%来自视觉,视觉当仁不让成为“最核心的感知力”^[1]。关于视觉对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中西方认识论史上都有很多论述,而西方表现尤甚。

在西方,存在一种深厚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一系列西方哲学文化上的核心概念,比如 theory, speculation, idea, illumination, enlightenment, phenomenology, lichtung 等都在辞源上与“视觉”和“光”(任何颜色都是一种对光的视觉效应)相关联。^{[2]3~9}诚如沃尔夫冈·威尔什所言:“在历史上,流行不衰的是视觉至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以颂扬视觉开篇,并且以它为每一种洞见、每一种认知的范式所在。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光的形而上学是单纯的视觉本体论。基督教的形而上学甚至以视觉隐喻来阐释神言,当然圣人们也都有了一个漂亮的视觉形象。在后人所谓的‘黑暗世纪’的末叶,视觉的优势日益高涨,达·芬奇称视觉为神圣,以它为世界基本真理的知觉。启蒙运动将光和可见性的隐喻推向极致,现代性依然不知有什么较透明更高的价值。”^{[3]258}同时,西方思想家们也一直在探讨“视觉”的历史,也就是

探讨今人与古人“视觉”的不同之处。视觉历史论认为,视觉体验会在历史进程中变化为各种方式。^{[4]311}代表人物瓦尔特·本雅明确写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整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5]12}而本斯·纳内认为,是“视觉注意”(visual attention)具有历史,即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绝对相同的视觉景象有不同的注意点,因而“视觉注意”在历史进程中变化了。^{[4]324}比如说一个人年轻时对国旗这个符号了解不多,他“看”国旗时,只“注意”到很少的内容;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他对其祖国历史理解的加深,他“看”国旗时,就会“注意”到他以前不曾“注意”的细微之处。

视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如古史传说中仓颉“四目重光”、舜帝“重瞳子”,尧、舜是三眸子(《荀子》),《述异记》所记载的蚩尤“四目”,《神仙传》所记载的老子“大目”,都以神话的方式表明,在先秦时期,对超凡视觉能力的向往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另外,与心智通达灵敏的含义相关的汉字也常常与“目”有关,如睿智的睿,以目为义旁;宪章文武的宪(《说文》释“憲”,敏也),也从目得义。而盲、瞽等与视力疾病有关的字则往往表示心智的蒙昧。^{[6]11}不过,与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过于彰显视觉,反而对视觉极有可能为现象世界所蛊惑高度警惕,因而对视觉的可见性加以限制,并从而走向对不可见性的强调。虽然中国视觉文化与西方的视觉中心主义迥异,但根源于视觉的形象思维却有效地解决了视觉有限性的问题。

“象”属于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尚象”的文化。《周易》以“观象制器”来解说中国文化,汉字以“象形”为基础推衍出自己的构词法,就是确证。“象”的本意是动物大象,古代“象”与“像”通用,故“象”由动物名称而引申为一种视觉表象,一切显现之物皆称为“象”。“象”有多层次含义,如物象、卦象、意象和无形之大象。物象指具体事物的形象或景象,指事物自身所呈现出来的外观,如自然界的山川日月、风雨雷电等物都以其各自的形态而显现着自身。这种物象可引申而作为一种征兆或象征,依于形象又超越于形象,需要慧眼才能

辨识,如《易传·系辞下》:“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卦象是对自然物象的模拟抽象而形成的一种象数符号系统,用这套符号系统通达鬼神、预知吉凶祸福。“圣人立象以尽意”“圣人设卦以观象”,就是说先圣为了把握说明瞬息万变、难以把握的物象,依赖于物象而又超越于物象,创立了意义明确、便于言传的八卦及六十四卦,以观察卦爻之象来说明吉凶。意象是指感知主体的情感附着在客观的物象上面,象中有意,象中有我。意象不是一种与物象和占卜符号分离的他样的象,而是强调其对纯粹形式和物象的一种超越。意象侧重于通过语言表达意义。它已经从特定的、具体的物象中分离出来,并表达一个抽象的意念,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完全从形象中分离。象的最高形态就是无形之大象,老子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这种无形之大象,就是形而上的本体,就是“道”。不过,无论是卦象,还是意象或无形之象,都必须以物象为基础,没有物象,其他“象”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中西方文化中的视觉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符号”和“标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符号”“标识”虽然必须通过外在的物象或图像体现出来(符号形式),但这个物象或图像已经不再单独指某个具体的物象或图像,这仅仅是它的“能指”,“符号”“标识”还必须要有它的“所指”(符号意义),有了意义的参与才能成其为“符号”“标识”。当人们看到一个符号或标识的时候,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客观对象的外表,主体认知的语言、价值、理想都已经渗入其中。一个好的“符号”“标识”,其“所指”越大,附着在其上的价值与理想则越多。如何让“看”到“符号”“标识”的人投入更多的“注意”,“看”到“符号”和“标识”后面更多的意象和无形之象,虽然主要取决于“看”的人的“注意力”或境界,但“符号”“标识”的“所指”则提供了可能。如何让“符号”“标识”更好地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这是“符号学”、视觉理论等致力研究的内容。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符号”“中华文化符号”以及如何传播中华文化符号等都做了非常多的探讨。“符号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哲学研究

中的“显学”，一大批汉译西方符号学论著出版，中国学者或介绍、或综合、或有所创新的符号学著作也相继面世，较著者如李幼蒸《历史符号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符号学理论虽发端于语言学，但在文学、新闻传播、影视等领域也得到广泛运用。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研究成果虽不多，但也有比较深入的探索，如吴畏编著《中国文化符号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赵朱麟著《对外传播视野下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蒙象飞著《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版）等，李泽厚也曾选取“鱼”“龙”这两个符号和汉字这个符号系统来阐述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李泽厚：《论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纳日碧力戈在《民族三元观——基于皮尔士理论的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中，比较成功地将符号学运用到民族研究领域。宗争主编《民族符号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收录了部分运用符号学原理研究民族或民俗文化的论文，也提出了“民族符号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中华文化符号以及如何提炼中华文化符号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但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真正从各民族共享的角度来研究如何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这一问题，现实需要我们对这一重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二、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深刻内涵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过它们，人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识。因此，把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内核或精神通过“符号”“标识”等展示出来，就是一件极为重要而严肃的工作，因为如果提炼的“符号”“标识”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内核或精神，则会导致人们不能正确地接受或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因此，要提炼中华文化符号或中华民族标识，前提就是要准确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一）中华文化之要义

要准确理解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深

切理解中华文化是先决条件。理解中华文化，可以有纵向和横向两个进路。从纵向来说，中华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7]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又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8]总书记的两次讲话明确指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古”与“今”关系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古”，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今”，彼此唇齿相依、绵延赓续。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中的“古”与“今”相通与共，作为中华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这样三种文化形态都蕴含了中华民族最为深刻的精神追求，同时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的精神身份。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按照“古”与“今”的历史逻辑建立起来的。在当代，我们现今的中华文化发展方向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此不能去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更不能非“今”返“古”。^[9]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思想资源，狭隘的传统主义则不可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统领。

横向来说，中华文化是各区域文化、各民族文化集大成。从民族的角度来说，中华文化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的，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能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的贡献；少数民族文化也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缺乏认同。中华文化是“多元”与“一体”的高度统一，所谓“多元”，就是说各民族的文化都有

自己的特性,并且由于民族将长期存在,这种特性也将长期存在,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中,追求文化差异性实际上是每一民族的天性^①。所谓“一体”,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各民族文化中存在共性,并且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共性的因素是在不断增多的;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从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是“一体”的表现。“一体”与“多元”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一体”是方向和主线,“多元”不能突破“一体”,自外于“一体”;“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一体”不能压制“多元”,取消“多元”。

(二) 中华民族精神之内核

中华文化是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而凝聚、整合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当然是中华民族在各种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作为中华文化整合的核心,中华民族精神反过来又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存在起着认同和凝聚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引导和鼓励的作用,它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能动的内核和根据。^{[10][207]}可以说,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精神是三位一体的。对中华民族精神同样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理解。从纵向上来说,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历史继承性,其基本内容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就已不断生成。同时,中华民族精神又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在近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伴随着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精神还将日益得到完善。横向上来说,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对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讲话中说得非常透彻。他说:“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

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11]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人们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论述。张岱年认为《周易》所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12][328]}刘纲纪以理性精神、自由精神、求实精神、应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3]方立天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包括重德精神、务实精神、自强精神、宽容精神和爱国精神等五个方面。^[14]伍雄武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主要是崇德重仁、道德至上,群体高于个人、义务重于权利,救亡图存、以竞争求进步。上述这些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各有侧重,都有可取之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来没有如此之近。但是,离目标越近,前进的阻力往往越大,越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提炼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精神做了全面深入论述,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并从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四个方面阐释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还论述过多种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或缩影,如“劳模精神”“沂蒙精神”“焦裕禄精神”“抗战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等^[15],这些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这些精神昭示着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都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和生动体现。

(三)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

前文已指出,“符号”包含有所指和能指两个要素。任何一个事物(即便是想象中的事物)都蕴含着“能指”这个要素,但如果它没有“所指”这个要素,便不能称其为“符号”。如我们说一朵具体的玫瑰时,

如果这朵玫瑰不包含爱情或友谊的意义,则它仅仅是一朵玫瑰而已,却不能成为“符号”。中华文化符号就是指在中华文化中那些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或意义的元素,当人们看到这样的元素时,不仅能直观地意识到这个元素是中华文化的,而且还能从中自觉体认出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与意义。比如说,“龙”是中华文化的典型符号,虽然它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只是一想象中的存在,但当一个中国人看到“龙”这个符号时,就会意识到它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还能够自觉生发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正义秩序的坚持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华民族形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华民族形象包括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品格和体现这种精神、品格的视觉形象。比如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这显然是从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品格来说的中华民族形象的。狭义的中华民族形象就是指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品格的视觉形象,也可称之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或中华民族标识。因此,中华文化符号和狭义的中华民族形象实则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主要是从视觉意义上讲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

三、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路径

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决定了中华文化符号的不可穷尽性和中华民族形象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但如果我们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就会使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共同认识不断增多,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的一致性就会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不断得以铸牢。因此,这里的关键词是“共享”,我们要树立和突出的不是一般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而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什么样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才是各民族“共享”的,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树立”和“突出”,需要深入研究。

(一)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内容

语言是人们交流交往的工具,是人体器官的延长,同时,一种语言又规约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用索绪尔的话说,语言是准则,是一个整体,是分类原则。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的约定俗成,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16]28~37}罗兰·巴尔特也认为,“语言(language)是一种立法,语言结构是一种法规(code)”^{[17]4}。可以说,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或者说是民族的要素,相互依存,互相制约。^{[18]1}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相适应,中国同样也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且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与此同时,汉语言文字是全国的通用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识,学习好全国通用语言文字,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和义务。

学习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国家有80多种语言,30种左右文字,这么多语言文字都是中华文化大花园里的美丽花朵,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具有的凝聚作用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正如安德烈亚斯·威默所言,“如果不同的个体间能用共同的语言互相交谈,那么建立跨地区和跨越族群分界线的联系就更为容易。这可降低‘交易成本’,易于做出了解彼此意图所需要的努力、解决分歧和谈判妥协,并由此建立持久的信任关系。”虽然威默错误地认为方言是不同的语言,而把汉族看作是一个“族群同质而语言多样的民族”,但他指出,由于信件、报纸、书籍和政治小册子都用统一的文字也就是汉字写成,“这种统一文字的本质使得讲不同语言的居民可以轻松地相互理解”,“书写文本的同质性降低了政治交流的交易成本,从而允许思想的传播,以及连接起跨越帝国广大领土和多语种群体的联合和恩庇的网络。就如单一书写文字在几千年中国为帝国的政治整合提供了沟通的黏合剂那样,它在现代大众政治时期促进了民族/国家建构。”^{[19]12、154~155}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

形成的理论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推动共同体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②

更进一步说,汉语言文字作为我国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各民族“共享”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的代表性符号之一。^③这种“符号”实际上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当人们看到汉字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这与中华文化相关联。二是汉字本身是以象形文字为基础,就是把实物的外形轮廓作为符号,文字像实物的形状,以形表义,从而使得每一个汉字成为独特的符号,还随着人们对其理解的越发深入,其所展现出的“所指”就越大。因此,汉语言文字更能给人们带来视觉形象的冲击从而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每一位中国人都有学习和使用它的权利与义务。然而,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普及在我国还面临艰巨的任务。有研究表明,部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识字量、正字法和阅读理解还没有达到及格水平。^④有些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任务还非常重。这些现象都不利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不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当然也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要聚焦一些使用国家语言文字能力比较弱的地区,因地制宜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适时推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当然,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是并行不悖的。

(二)全方位推动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建设

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推进的工作。一方面,对什么符号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什么标识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标识的本身就有一个如何形成共识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指出的,中华文化和中

华民族形象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事物,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中华文化符号或中华民族标识。因此,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也是一项不会完结的工程。

对那些已经形成共识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要在“突出”上下功夫。这样的符号或标识很多,如前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的国旗,出现在国徽里面的天安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节日如春节、国庆节等,体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情的符号(如含有56个民族人物形象的图画、体现多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园),等等。这些符号或标识多了,人们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就会不断得到强化,人们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就会不断树立。

要按照政治性强、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接受度高的要求加工、提炼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在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前提下,从服饰、建筑、器物、乐器、食物、艺术等等中间,加工提炼出一大批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符号与标识,这有待对符号理论、视觉理论的深入研究,当然也需要哲学、艺术学、建筑学、人类学、民族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介入方可实现。在学术界深入研究的同时,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可以组织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的设计大赛,评选出一批各民族认可度高、传播力强的符号或标识,并通过建筑、标牌、展会、影视、新媒体等进行展示。

(三)注意挖掘中华各民族文化中同质性一体性的内容

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多元性容易理解,但挖掘中国文化中的一体性,也就是各民族文化中的共同性因素,无疑有助于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精神这项工作。

1.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同质性、一体性的主要表现

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同质性和融合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出来。例如,在世界观领域,中国古代各民

族传统意识形态中最突出、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天人关系。在中国古代,许多民族都将“天”视为超人、超神、超自然的宏大伟力。人世间最高的统治者是天子,他是受天命来统治人类;中国民间有一句流行很广的名言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事业的好坏、成败都是由上天的意志所决定的。因此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几乎就成为那时许多民族判断事物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进而也成为古代中国许多民族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像是在政治生活等方面,伴随着秦汉等皇朝时代的来临,各民族都主张“大一统”。尽管他们的政治管理形式或许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民族都主张在自己的民族地区或在华夏其他地区建立的政治机构中实行集中管理。在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方面,他们重视诚实,轻视欺诈,重义轻利,重社会,重集体,轻个性。这些概念既是群体意识,但也是个体行为,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中广泛流行。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和同质化,是各民族长期交流和交流的结果,也是各民族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基础。^[20]这样的挖掘越多,我们就越能从中提炼出更多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标识。

2. 挖掘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因

前文已指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需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因为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因,这里面当然有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借鉴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民族传统文化自身中就有这种思想资源。如崇德重仁、道德至上的价值观,既贯穿于汉族传统文化之中,也贯穿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白族从远古就是“夷中最仁,有人道”;壮族民族伦理长诗《传扬诗》是一部道德教育的长诗,其中有《孝敬》《睦邻》等篇目;苗族有《议榔词》《理词》,侗族有《款词》;布依族有《晓喻碑》《垂芳千古碑》;等等。在这些道德教育诗或哲理化的乡规民约中,概括和凝结着各民族传统的道德规范,

以及重民的民族精神。^{[10]239~240}各民族文化中爱国主义、法治精神的养分也非常之多,如维吾尔族有谚语“最崇高的爱情是爱祖国”“心坦荡的手慷慨,爱祖国的路宽广”“没有领子不能成为衣裳,没有法律不能成为国家”,回族有谚语“顺从国法是穆民的本分”等。如果我们的符号和标识多体现这些内容,则能更容易为各民族所接受。

3. 从“独享”到“共享”

我们说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与“多”的关系,也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一多相即”,普遍性离不开特殊性,特殊性也有转化为普遍性的可能。在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各民族文化符号成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如何可能的问题。虽然我们说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符号就能当然地成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因为“一”不是“多”的简单相加,特殊性如果不转化为普遍性,“多”就不能体现“一”。各民族文化中,有些特殊性已经转化为普遍性,有些还在转化的过程中,有的有转化的潜能但还没有开始转化,有的转化的可能性比较小。比如说,当我们提起《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史诗的时候,当我们提起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的时候,我们立刻会意识到这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或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实际上,各民族文化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关键是需要去挖掘、宣传,从而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同时,在发展民族文化的时候,还必须思考,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在何种意义上代表中华文化,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否从中提炼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标识。

四、余论

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但一些理论界限和政策界限都必须把握清楚,否则就容易走向反面。一是在方向上,一定要把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二是在理论上,要讲清楚强调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并不意味着忽略或取消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进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三是在实践上,要认识到树立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让一些符号或标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享”的符号或标识,不能将还不是“共享”的符号或标识硬性加以树立和突出为“共享”的符号或标识。

注释:

①美国全球化理论家罗兰·罗伯森在《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一书中将全球化定义为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文化都会追求差异性。见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②安德森认为,印刷语言用三种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一是印刷语言使原本没机会接触、交谈的人能被印刷的文字和纸张连接起来,他们作为共同的读者在不见面的情况下“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二是印刷赋予语言以固定性。印刷语言对于语言内容的确定性和塑造民族理念的稳定性起重要作用。三是印刷语言是将口语和方言的声音系统转译成视觉的表记系统,在这个由声转形的制模过程中,表记符号能够超越声音的多样性差异,从而整合成一个涵盖范围更广的视觉理解的共同体。这其中的部分观点显然和安德烈亚斯·威默有一致之处。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74~78页。

③虽然汉字也是汉字文化圈如越南、朝鲜、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其他国家的重要符号,但汉字在这些国家的重要程度无疑没有在中国的重要程度高。

④参见《新疆少数民族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阅读状况调查评估》(调研报告)。

参考文献:

- [1][美]劳伦斯·罗森布拉姆.感知力:最重要的生存力与最强大的影响力[M].钱梦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 [2]高秉江.现象学视域下的视觉中心主义[M].武汉:华中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德]沃尔夫冈·威尔什.走向一种听觉文化?[C]//陆杨,王毅,译.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4][比利时]本斯·纳内.视觉的历史[C]//朱志荣.中国美学研究: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6]刘泰然.中国古代视觉意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4-16)[2022-05-6].https://www.ccps.gov.cn/xt/202104/t20210416_148373.html.

[8]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全文[EB/OL].(2017-10-18)[2022-06-07].https://www.spp.gov.cn/tt/201710/20171018_202773.html.

[9]李维武.中国文化的古今变化及其联系——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10]伍雄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1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9-09-28)[2022-07-02].https://www.ccps.gov.cn/xxsxk/zyls/201909/t20190927_134584.html.

[12]张岱年.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C]//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13]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J].武汉大学学报,1985(1).

[14]方立天.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J].哲学研究,1991(5).

[15]总书记点赞过的那些中华民族伟大精神[EB/OL].(2020-05-16)[2022-07-0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828792424900263&wfr=spider&for=pc>.

[16][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7][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8]戴庆厦.民族与语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M].叶江,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

[20]杨建新.再论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J].民族研究内参,2020(2).